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

——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朱 徽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

——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朱 徽 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 朱徽
著.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1281-4

I. 中… II. 朱… III. 古典诗歌-中国-英语-翻译-
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571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 欣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281-4 / I · 0084

定 价: 2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王宗炎 (中山大学)

刘重德 (湖南师范大学)

主任委员: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委 员: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汪义群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罗选民 (清华大学)

郭建中 (浙江大学)

郭著章 (武汉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语学院)

谭载喜 (深圳大学)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自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30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作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序

三个多月前收到一部书稿，就是这本《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以下简称《汉诗翻译》），是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教授朱徽先生的又一力作。翻开书页，内附一信，使我惊讶：朱先生嘱我为这部书写篇序言。这件事我哪里敢应。朱先生长我几年，在学术上却是我的前辈，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在大学教书了，我哪里有资格为这本书作序。可是朱先生亲笔诚意相请，我又怎能不应。真是进退两难，踌躇良久，顾不得笔下羞涩，谈谈我的读后感想。

西方汉学始于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虽然也有把汉学的源头推前到马可·波罗的说法。早期的汉学研究以传教士的贡献最大。他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目的是为了西方教会了解中国传统和风俗习惯，从中发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相通之处，以便顺利传播上帝的福音。他们很早就将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了西方文字。他们回国以后，很多人成了第一代汉学家、大学汉学系的创始人。后来研究中国的学者，很多都是传教士培养出来的精英。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的成就最大，它始终占据着首要位置。中国文学译成西方文字，最早也是从诗歌开始的。传教士的初衷是要改变中国，而他们后继者的努力却一度改变了英美诗坛的潮流。

将历来重要汉学家的英译汉诗，以译者为单位集为一册，《汉诗翻译》是第一次。这是一个翻译教授的选本，从翻译的角度出发，以译者为中心，以翻译方法策略为主线，配以实例，讨论汉诗译体的发展和流变。全书20章，精选了20位成就突出的翻译家。所选的作品不一定是诗人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也不一定是译者最佳的译作；选题的着眼



点在于各个时代译家本人的气质、翻译思想和翻译特色。入选的翻译家都能代表一个时期或一个翻译派别，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诗英译的发展史。

《汉诗翻译》的体例也有特色。首先是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译者的生平著述和在诗歌翻译上的贡献，为研究提供一个背景。翻译方法的描述结合译者的翻译思想、英国本土诗歌形式规范和翻译规范，主要围绕诗歌翻译中的关键词——“格律”的问题展开。对译诗的分析采取点评式，三言两语点出译文的风格特点、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译文的成败。论述重点各个不同，因人而异，突出诗人型翻译家和学者型翻译家的各自特点和追求。

各章的标题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妙。一句话，多数是一个动词语，或勾勒出译者的主要成就，或点出译作的突出特点，或描绘出译者的气质情怀。突出的一点是朱先生在点评译文当中，应用了现代翻译研究的成果，分析译者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将评论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汉诗翻译》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汉诗英译著作，是朱先生多年来材料的积累和课堂实践的结晶；同时也对研究生的汉诗英译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大量的论文题材和初步的资料，使每一位翻译家都能成为一篇研究生论文的课题。

以朱先生的资历，仍然“板凳宁坐十年冷”，仍然在做这样吃苦费力的文本功夫，实在令人钦佩。我这里谨对朱先生的成就表示祝贺。

朱志瑜

2007年冬月



目 录

绪论：英语世界汉诗翻译概述	[1]
第一章 理雅各：开创西方汉学新纪元	[23]
第二章 翟理斯：以西方传统重构中国古诗	[36]
第三章 克莱默-宾：展示维多利亚诗风	[48]
第四章 洛威尔：在翻译和创作中追求意象	[57]
第五章 弗莱彻：继承格律体译诗传统	[71]
第六章 宾纳：对唐诗的诗意诠释	[81]
第七章 庞德：为西土移植神州种子	[93]
第八章 韦利：将心灵遥寄东方	[115]
第九章 雷克思洛斯：毕生追随“诗圣”召唤	[130]
第十章 海陶玮：现代西方的东方隐士	[148]
第十一章 葛瑞汉：诗译中的哲思色彩	[157]
第十二章 罗郁正：执著的故国情怀	[168]
第十三章 霍克思：重构文学经典的大师风范	[182]
第十四章 华兹生：坚守心中的东方圣土	[194]
第十五章 白之：跨越欧美的中国情结	[205]
第十六章 刘若愚：译诗复求古人意	[216]
第十七章 斯奈德：皈依佛门的美国诗人	[228]
第十八章 叶维廉：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	[242]
第十九章 欧阳桢：以透明之眼观世界	[259]
第二十章 宇文所安：熔铸当代西方汉学之辉煌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85]

后记 [289]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

英语世界汉诗翻译概述

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已经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由于中国古诗在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与西方诗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汉诗英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英语世界的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很早就开始了跟中国的文化交流。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在汉诗英译方面做出了具开拓性的重要历史贡献。跟英国和其他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历史要短得多。跟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欧洲许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相比，中国文学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时间也要短得多。然而，由于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崛起，西方汉学中心从欧洲转向了美国，中国诗歌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成了战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标志。“绪论”将对不同时期中国诗歌在英美的翻译与接受作一番审视与探索。由于相关资料卷帙浩繁，无以数计，所述所论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各时期和各种类的重要作品和译者将尽可能地收入并作简要的评述。

一、基础理论观念

翻译的历史几乎和人类语言的历史一样悠久，在人类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翻译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视，则迟至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之后。当代一些著名学者非常强调翻译研究跟历史文化、权利关系和社会发展等之间的重要关系，使翻译研究超越了“文本批评”(text criticism)的传统模式。当代翻译研究发展迅速，已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一些现当代



理论观念如“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描写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及综合研究方法(integrated approach)等极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一个多世纪以来,英美译者的汉诗英译持续进行,其范围逐渐扩大,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不断提高,为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材料与实证。

理论家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即意识形态、专业人士、赞助力量和主流诗学(ideology, professional, patronage and dominant poetics)等,其中的“主流诗学”观念包括文学手法和样式等;^①这些观念使研究者可以深入观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英美译家翻译汉诗的不同理念、策略和形式等。勒菲弗尔提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传播文化资本”(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及“种子移植”(seed transplantation);^②这些观念也可切实指导研究者分析蕴含在汉诗中的中国文化要素是如何通过英美译家的翻译进入英美及西方世界,进而影响英美的文学创作甚至社会文化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在汉诗英译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传输与误释、英美译者的文化身份与主体性、社会文化对诗歌翻译的制约、诗歌翻译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等多重要素。

美国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指出,“描写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的目的是描述与翻译过程和与翻译作品相关的现象,“从广义上讲,与翻译相关的所有现象都成了研究对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成为翻译研究领域内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途径。^③又如在翻译理论界创立特拉维夫学派的以色列理论家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详细阐释翻译文学与

-
- ①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128-129.
- ②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I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41-45.
- ③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eds.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35.





译家。英国很早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建筑和园林艺术等。^①在诗歌方面,从16世纪末以来,英国就一直在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歌。据现有资料记载,汉诗被译成英文,最早见于英国学者理查德·普滕汉(Richard Puttenham, 1520-1601)在16世纪后期出版的《英文诗艺》(*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1589)一书中,作者在讨论英文诗歌格律的时候,译介了中国古诗,以此率先向英语读者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②这是我们迄今见到汉诗英译的最早记录。

首批将中国古典诗歌译成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据称,第一位将《诗经》译成法文的是耶稣会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 1577-1628),可惜其译文并未传下来。西方学者公认的最早西译《诗经》是法国传教士孙璋(P. Alexander de la Charme, 1695-1767)的拉丁文译本。跟孙璋同时进行《诗经》翻译与研究的传教士还有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ieu, 1671-1745)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0)等。马约瑟神父(Joseph Henri-Marie de Premare, 1666-1735)翻译的《诗经》中《天作》和《皇矣》等八首诗歌,发表在杜赫德(J.-B. du Halde, 1674-1743)主编的《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1736年第2卷上。这是对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法国汉学巨著,其主编杜赫德还专门撰文介绍《诗经》,这是我们迄今见到最早介绍《诗经》和中国古诗的西方文字。英国学者在1738至1744年间翻译出版了这部书,这是英译《诗经》的开始。后来英国汉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用拉丁文和英文翻译了《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等)。后来又出现了由英国驻华外交官阿连壁(Clement F. R. Allen)用格律体翻译的《诗经》(*The Shih Chin*, 1891)。中国古诗译入西方语文,法国译者的贡献很大,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是由法国贡古尔学院女院士柔迪特·戈蒂叶(J. Gautier)翻译的中国古诗选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 1867)。《玉书》在西

①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方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译成多种语言。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将《玉书》德文译本中所收李白、王维和孟浩然的诗篇作为歌词，写成了享誉世界的合唱交响乐《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从19世纪末起，美国诗人斯图尔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开始将《玉书》转译成英文(1897)。到20世纪初叶美国新诗运动兴起之时，《玉书》更是多次被转译成英文，其中包括：詹姆斯·惠特尔(James Whittell)的《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 1922)，马瑟斯(E. P. Mathers)的两本东方情歌选《彩星》(*Colored Stars*, 1919)和《清水园》(*A Garden of Bright Waters*, 1920)中的中国诗歌部分，由斯坦布纳(Jordan Herbert Stabler)译的《李太白诗选》(*Songs of Li Tai-po*, 1922)，乔里逊(G. L. Joerissen)的《失去的笛》(*Lost Flute*, 1923)以及艾·柯尔文(Ian Colvin)的《仿中国诗集》(*After the Chinese*)等。这些从法文译本转译的英文译本，为中国古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打开了门户，铺就了道路。

论及中国文学被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进而扩展和影响到整个英语世界，就必须谈到英国汉学界的三大宗师。他们是德庇时、理雅各和翟理斯。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外交界，曾任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他的《中国概览》(*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1836)被译成多种文字，风行西方。他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翻译过《好速传》和《汉宫秋》等，所著《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1829)先在伦敦初版，后由澳门东印度出版公司再版(1834)，再由伦敦阿谢尔出版公司增订再版(1870)。德庇时的选本主要选收“歌”(verse)，如采茶山歌和从传统小说戏剧中选取的歌谣，选本中少有“诗”(poetry)，即中国诗歌中的著名诗人诗作等，这说明他对中国的诗歌传统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此书对于英国及西方世界开始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起了一定作用。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英国传教士，曾在希伯利神学院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又在伦敦大学学习汉语。他在中国办学和传教长达30年(1843-1873)。理雅各熟谙中国语言文化，在中国学者(如

王韬)的帮助下,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题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1861-1870),共22卷之多,其中就包括《诗经》等四书五经,以及《楚辞》等中国古典诗章(详见本书第一章“理雅各:开拓西方汉学新纪元”)。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对文学经典抱有浓厚兴趣。他青年时代来华,在英国驻华使领馆作翻译,后来升任副领事和领事。他辞去外交职务返国后,接替威妥玛担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长达35年,继续培养汉学人才。翟理斯在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编译有《中国文学撷英》(*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4, 1898, 1923, 1965),共两卷(诗歌和散文各一卷),曾多次重印,翻译介绍中国历代诗文作品。他还著有《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首次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作了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考察和评述。1897年,此书被列为由戈斯(E. W. Goss)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之第10种,后又多次增订再版(详见本书第二章“翟理斯:以西方传统重构中国古诗”)。上述英国汉学三大宗师为中国文学进入英语世界和西方世界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翟理斯在剑桥大学培养后继的汉学传人,其中最优秀者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韦利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自幼聪颖过人,酷爱语言文学。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大英博物馆图书绘画部工作,后被母校聘为名誉教授。他的突出特点是,其前辈都曾长期在中国担任传教士或者外交官,他却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所以被誉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中国通’”。韦利为将中国古典文学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付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取得了突出成就。他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专著译著有27部,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主要译著包括《汉诗选译》(1916),《汉诗选译170首》(1918),《汉诗选译补编》(1919),英译本《诗经》(1937)和多种中国诗歌选集等。韦利因译介中国古典诗歌及其他典籍而取得的巨大成就,于1953年荣膺英国女王诗歌勋章。韦利的成就和贡献具有重大意义,他不仅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东方和中国文化的宝库,还为在西方世界长期不受重视的汉学研究赢得了声誉与荣耀(详见本书第八章“韦利:将心灵遥寄东方”)。韦利还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学者,他又培养了下一代汉学家,如